

总 序

词兴起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复振起于清代。清词接武两宋,踵事增华,不仅有继承,而且有发展,成为词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传统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认为,“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由此,不少学者遂持“宋后无词”的片面看法,对金元明清词非贬抑则忽略,以致造成了词史研究的许多断层。但是,清词确实上继两宋之盛,体现出了全新的时代特色。

首先,较之宋词,清词的境界更为开阔。从明清易代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直至清王朝被撼动以至被推翻,一切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无不在清代词人笔下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表现。尤其是嘉道以降,外侮频仍,鸦片战争的烽火和八国联军的刀枪,都深深震撼了词人们的心灵,使他们的词作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怆。可以说,只有到了清代,才彻底破除了“诗庄词媚”之类的旧说,几乎无事不可以入词,从而使词成为一种在描写对象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完整意义上的抒情诗体。其次,清代著名的词家,如朱彝尊、张惠言、周济、谭献、王鹏运、朱祖谋、王国维等,多为学人,其以治经之法治词,不仅对词集的流播校辑贡献甚大,而且冲击以至打破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外,更增入学人之词一派,从而拓宽了词之疆域。第三,清代词派纷呈,迥异前代。自明末陈子龙创立云间词派,流风所及,主宰顺治一朝。康熙年

间,阳羨、浙西二派高标并举,陈维崧、朱彝尊领袖词坛,使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八九”(谭献《篋中词》二),而浙派影响尤大。沿及嘉道间,张惠言兄弟《词选》出,创立常州词派,经过周济、谭献为之掇扬,每变愈上,不仅在清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降及近现代词坛,亦每见其流风余韵。而属于上述流派又加以变异者,或不属特定流派而自出机杼者,亦复不少。第四,创作的兴盛引起了理论的繁荣。清代的词论发展达到了宋以来的最高水平,从一个方面开拓了抒情诗的理论,同时也就提高和发展了其创作,比起前代词论实不可同日而语。理论既是创作成果的总结,又推动着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互相促进,清词才高潮迭起。第五,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多,亦达到空前的程度。据已出诸总集统计,唐代计有词人 170 余人,词作 2500 余首(据张璋等《全唐五代词》统计。按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收录较此为多,但诸家标准不一,也无法统一);宋代计有词人 1430 余人,词作 20860 余首(据唐圭璋《全宋词》、孔凡礼《全宋词补辑》统计);金代计有词人 70 余人,词作 3570 余首;元代计有词人 210 人,词作 3720 余首(金元二代据唐圭璋《全金元词》统计);明代计有词人 1860 余人,词作 25000 余首(据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以及周明初等《全明词补编》统计)。而清代仅顺治、康熙两朝词人,已达 2500 余家,词作 60000 余首(据《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统计)。准此而论,清代词人当在 1 万以上,词作当在 25 万首以上。当然,数量并不等于质量,多并不等于好,但数量必然表现出一定的质量,也是事实。第六,清词往往对前人已经开创的境界,加以深化,即在摹拟中求发展,不仅追求风格的多样化,更进一步追求多种风格的熔铸,从而创造了更广泛深微的艺术境界。

以上所举,或有不够全面之处,但清词的价值已大略可见。前辈学人多有倡言清词中兴论者,如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云:“词

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及我朝而其道大昌。”徐珂《清代词学概论》云:“词之学剥于明,至清而复之,直接南北两宋,可谓盛矣。”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摄影》更具体分析了清词能上接两宋的原因,一在托体尊,二在审律严,并宣称:“我看清代文学多不能超越前代的。如曲不及明,更不及元;又诗也不及明朝,独词较好。可知清人对于词的研究深切了。由此看来,清词立在重要的地位,定无可疑的。”这些都并非无的放矢之言。

学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求观念的更新和资料的发现。从观念来看,有必要特别提出经典化的问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即唐宋词在词学大盛的清代,已经经过了非常充分的经典化,取向或许有不同,但流别却非常清楚,清人所建构的比较完整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现在读者接受唐宋词的一座重要桥梁,王国维诸人所提出的观念,也正是在清代学术的大背景中展现出来的。然而,这一经典化过程,“五四”以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却处于中断的状态。尽管比较传统的词学研究者如上述沈曾植等人已经对清词的价值有过论定,可是,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强势影响下,真正进入接受领域中的清词,与其庞大的创作队伍相比,完全不成比例,这就导致人们对清词的整体风貌认识不清,新的经典也因而无法产生。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资料的问题。清词在词的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基本上处于“缺席”,这种情况的造成,也和清词资料的零散、缺乏整理有关。二者事实上互为因果:对资料的掌握不足使得观念的更新缺少动力,而观念上的一成不变,也忽略了对资料的全面搜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学术的生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主导下确定的研究格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对于文学经典的体认,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现有的成说上面。在这种背景中,清词的研究也呈现出全新的气

象,而《全清词》的陆续编纂出版则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将编纂《全清词》的任务下达给南京大学中文系,从而开始了这一划时代的大型文献整理工作。在此之前,清词的汇辑,自清朝初年起,直至清末民初,都有人做过。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蒋景祁的《瑶华集》,蒋重光的《昭代词选》,王昶的《琴画楼词钞》,以及近人叶恭绰的《全清词钞》等,或卷帙繁富,或编录精审,都保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资料。但这些总集虽然各有特色,就其本身来说,仍只是一种选本,意在“以词存人”或“以人存词”,并没有想要汇辑所收作家的全部作品。近人陈乃乾辑录《清名家词》,计收有清一代著名词人百余家,人各成集,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汇辑,但他所辑也只是初步工作,所用底本有时并非足本,给使用者带来不便。编纂《全清词》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价值:1. 展示清词的整体风貌;2. 丰富词史的研究思路;3. 为作家研究提供完备的文献;4. 传记资料可补史传之阙;5. 校勘工作可提供多方面参考。2002年,《全清词》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卷《顺康卷》,凡20册,810万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清词研究的走向深入。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至今,以清词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出版了13种,以清词研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更达24种以上。所有这些,都体现出这一新的学术领域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以及远大的发展前景。《全清词》的其他各卷还在积极的编纂中,一旦出版,对清词乃至整个词学的研究所产生的进一步推动,乃是可以预期的。

二十五年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从事《全清词》编纂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清词研究的深入展开。通过文献整理和理论探讨,我们深切地感到,研究清词,不仅是对一个陌生领域的开拓,而且是对一种传统观念的更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点有着更为深刻的

意义。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编纂了这套《清词研究丛书》,以展现词学研究的新进展。清词研究现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渐成这一领域的生力军。我相信,随着观念的进一步解放,一个新的繁荣局面不久就会到来,词这一经过漫长发展的文体在清代开出的“老树新花”,必将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是为序。

张宏生

2007年9月6日

目 录

总 序	张宏生	1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研究状况		4
三、研究目的		7
第一章 群体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		9
第一节 清初遗民词人群的出现和解体		9
第二节 遗民词人群的总体分布及成分		22
第二章 群体网络的地域分布及形态特征		26
第一节 江苏词人群		27
一、以蒋平阶为首的云间词人群		27
二、以吴门为中心的松陵、毗陵词人群		34
三、以余怀、杜濬为首的金陵词人群		45
四、以北湖三家为首、以水绘园为中心的广陵词人群		51
第二节 浙江词人群		54
一、以柳洲为中心的嘉善词人群		54
二、以梅里为中心的嘉兴词人群		63

三、以钱塘为中心的西陵、湖州词人群	75
四、以山阴、四明为主体的浙东词人群	87
第三节 以岭南为中心的湖广词人群	90
第四节 以临川为中心的江西词人群	95
第五节 京都词人群	97
第三章 群体网络的布局结构特征	102
第一节 西陵词人群的互动——徐、卓二人的 “栖水倡和”	103
第二节 嘉善词人群的互动	107
一、“壑专堂”倡和	107
二、“虞美人曲”倡和	110
第三节 云间词人群的互动	119
一、云间诸子与《倡和诗余》	119
二、蒋平阶与《支机集》	129
第四节 广陵词人群的互动	137
一、特社与《北湖三家词钞》	137
二、以冒襄水绘园为中心的倡和	150
第五节 江西词人群的互动——癸秋倡和	167
附论：万寿祺与《遯渚倡和词》	172
余论	176
第四章 群体的多元选择	
——清初遗民词人群的生活形态及其他	186
第一节 关乎出处大节的抉择	186
一、仕与隐	186
二、试与不试	196

第二节 多元的生活方式·····	198
一、隐居·····	201
二、逃禅·····	203
三、漫游·····	213
四、讲学·····	218
五、其他·····	220
 第五章 群体的创作特征·····	 224
第一节 主题取向·····	224
一、故国之思·····	225
二、离乱之叹·····	240
三、英杰之吊·····	250
四、友情之慰·····	255
五、隐逸之情·····	260
第二节 赋、比、兴手法的继承和新发展·····	266
一、比兴手法的继承与新变·····	269
二、赋的手法的新发展·····	289
 第六章 群体的词学理论·····	 301
第一节 云间词派的嬗变——兼论比兴说词在明清 之际的发展·····	 301
一、云间词派前期的词学主张与明代词学思潮的 关联·····	 301
二、云间词派后期的分化与当时词坛风尚的转变·····	312
第二节 苏辛之风与明清之际的词坛·····	323
一、明末词坛:风格多样化的认识和接纳·····	325
二、顺治年间:风格多样化的主张·····	328

三、康熙初年:苏辛之风的盛行	332
第三节 沈谦《词韵略》与清初词韵研究	344
一、清代以前的词韵书	344
二、清初词人对词韵的研究	347
三、沈谦《词韵略》出现的原因	351
四、沈谦《词韵略》	358
附论:《瑶华集》的编纂与传播及清初遗民词的接受	372
一、《瑶华集》的编纂过程	373
二、《瑶华集》的编纂意图	375
三、《瑶华集》的流播及词史对它的接受	391
结语	400
 附录一:明清之际词学年表	405
附录二:清初遗民词人群成员考	451
一、《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及《明遗民录汇辑》失收的 遗民词人考	452
二、不属清初遗民词人群之人员考略	454
三、文献记载生平事迹有误的遗民词人考	461
 主要引用书目	468
后 记	480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明清易代之际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重大的转折点之一。刘梦溪先生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流变，有三个历史分际之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都是天崩地裂、社会转型、传统价值观发生危机、新思潮汹涌竞变的时代。”^①学术思潮的嬗变无疑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莫大的关联，而作为人类心灵折光的文学作品更不可避免地隐现时代的影子。“国家不幸诗家幸”^②，社会的变革往往促成文学创作的重大突破和繁荣。陈伯海先生也指出“文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三次高潮，它们都发生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前两次发生在周秦之交和唐宋之交，分别标志着作家文学的开始和士大夫正宗文学的全面成熟，“第三次则在明清之交”，“整个古典文学到了总结的阶段”^③。时代环境的变迁，尤其是以异族政权全面取替汉族政权为特征的明清鼎革之变，对士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

①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26日。

② 赵翼《瓯北集》卷三十三《论诗绝句》其十二《题元遗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③ 《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第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的哲学、史学、文学及其他的学术文化在相应的领域内成为富于总结性和开拓性的集大成者。其中,成就最显著者莫过于遗民学术。

单就遗民的文学研究而言,遗民诗学的研究颇获研究者的青睐,遗民词学的研究则相对冷落。严迪昌先生指出:“历来言清代文学必以‘遗民’列其首,论‘遗民’作家又必首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彰扬先贤,崇其品节,诚为治文学史者题中之义。然而文学史毕竟不同于思想史或社会发展史,文学自有其本身演变的轨迹。至于各类文体之间更有难以用同一框架所能划一界限的差异,它们各自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过程是不可能互相取代的。以清初词与诗相比较而言,遗民之词远不如遗民之诗影响深远。”^①可能基于这一认识,遗民词的研究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遗民词之影响固然不及遗民之诗,但若立足于词史本身的发展角度而言,遗民词人徐士俊、蒋平阶、沈谦、金堡、王夫之、屈大均等人分别在词学理论的构建及创作实践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清初词学之复兴实功不可没。而遗民词人在理论及具体实践中重视比兴寄托,鼓扬苏辛之风的倾向与其政治立场、遗民心态之关联,自不待多言。即便是对词韵的尝试性研究,亦无不带有清初遗民学术的总体批判精神和求实之风。

此外,香港学者吴宏一先生认为:“讨论文学与世变关系的人,有时候过于强调世变对文学的影响,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特别是把‘世变’的意义囿限于改朝换代的解释时,几乎把文学都视为政治的附庸,而忽略了作家个人的情志和文学独特的生命。……事实上,清初在顺治以前,词坛风气和明代是联系在一起的,都还在《花间集》、《草堂诗余》好尚成风的笼罩之下。……清

^① 严迪昌《清词史》第9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版。

代词学风气的转变,严格说来,其实是在康熙年间。康熙年间,政治已趋稳定,已非江山易主、干戈纷扰之际。”^①诚然,任何一种研究思路都应以尊重历史原貌为前提,过分强调世变自然失于偏颇,而过分强调“作家个人的情志和文学独特的生命”亦非可取。因为作家自身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其个人情志亦包括社会感情的成分在内。即使是较少参与社会活动的女词人,如南宋的李清照、清初的遗民词人商景兰、刘淑等人而言,她们的作品虽然缺少对社会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正面描写,但亦有不少离乱之思、身世之感的抒发。我们不能否认其中社会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至于清代词学风气之转变,若后推至康熙初年,亦不合词史发展的本来面目。遗民词人蒋平阶提出比兴寄托的词学主张发生在顺治九年(1652),沈谦《词韵略》亦成书于顺治五年(1648),至于清初词坛对多样风格的认识和接纳则可上推至崇祯二年(1629)徐士俊、卓人月《古今词统》之编成,而清初遗民词的创作已呈现渐重比兴,言之有物的整体风貌。这些现象的出现已说明当时的词坛已非《花间》、《草堂》风尚所能牢笼。再者,以康熙年间清词的复兴来说明词坛风尚的转变与江山易主的时代巨变并无关系,似亦不合乎清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虽已覆亡,但朱明正朔在弘光、隆武、永历诸南明政权的辖区中延续,至康熙元年(1662)缅甸方向清廷献出永历帝,南明政权方告结束。但抗清力量尚未平息,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氏家族投降清廷,清朝的统治才基本稳定。对于“明末清初”的下限,学术界亦有不同的意见,定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左右,应是较为合理的划分。大部分遗民眷恋故国旧君,以图恢复的心志亦一直延续至其时。这在遗民词的创作中皆有迹可寻。因此,明清鼎革之变与清词复

① 吴宏一《清词与世变、寄托的关系》,《学术研究》2003年第3期。

兴的关联并非一个简单的时间分界就能割裂两者的联系。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清词中兴的契机,龙榆生指出:“词学中兴之业,实肇端于明季陈子龙。”这一论断在词学界影响甚为深远。其实,陈子龙的词学理论更多地体现为对明代词学思潮的继承而非开拓,其创作实践虽然出现了变化,(主要指明亡后的作品)但总体上是对《花间》、《草堂》风尚的沿袭而非创新。关于陈子龙对清词中兴所起到的作用亦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总之,若能正确把握世变与世变中的文学的关系,在整体观照的基础上加以通盘考察,那么,遗民词的研究将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同时,对于遗民文学,乃至遗民学术的总体研究来说,也将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再者,遗民词人虽未包括顾炎武^①、黄宗羲等人,但他们作为遗民总体的构成部分,在亡国灭种之时所体现的民族气节和人格魅力,直至现代皆有其现实意义。这也是研究遗民词的价值与意义之一。

二、研究状况

二十世纪末以来,关于明清之际的文化研究在不同维度上向纵深方向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谢国桢、稽文甫等学者主要从学术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潮、社会风尚,及明清士人的价值取向。研究专著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稽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赵园《明清之际士大

^① 署名顾炎武的《黄山纪游词》,系贻品。见严迪昌先生《清词史》第98页。

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三联书店,2004)等;研究论文有杜春媚《从归庄看明遗民多样性的生存选择》(《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郑传斌《从思想史角度论明清之际夷夏观念的嬗变》(《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邵红《遗民心事——论〈陶庵梦忆〉一书的性质》,收入《台静农先生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Willard Peterson,“The Life of Ku Yen-wu (1613—168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29 (1968/69)等。赵永济、周明初、谢正光等学者主要从文学角度考察明清士人的诗文词创作及文人心态。如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明清词派研究之一》、《〈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二》、《〈梅里词辑〉与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三》,收入《吴熊和词学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周群《释儒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上海书店,2000)、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等。

明遗民作为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现阶段关于明遗民的研究成果,有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遗民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旅美学者谢正光所纂《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明遗民录汇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等。这些都是近年来关于明遗民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明遗民的文学研究多数集中在诗学方面。如张兵《清初遗民

诗群研究》(苏州大学1994年博士毕业论文)、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关于遗民词的研究,国内至今尚无专著问世。严迪昌先生《清词史》限于篇幅,对遗民词人及其创作只作简单的介绍。至于单篇论文约有三十多篇。如龙榆生《读王船山词记》(《词学》第2辑)、罗子英《屈大均(翁山)〈骚屑词〉读后记》(《广东文献》1979年第4期)、涂仲涛《屈翁山生日考》(《学术研究》1980年第1期)、关照祺《读屈翁山〈骚屑词〉》(《广东文献》,1982年第4期)、邓国栋《深人无浅语,字字楚骚心——略论船山词的思想成就》(《船山学报》1984年第2期)、汪思宁《心灵的独白——读王夫之词》(《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第5期)、徐志平《“孤村铁笛”〈淳村词〉——明清嘉兴词人介绍(二)》(《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汪泰际《论明末清初遗民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李舜臣《释澹归与〈遍行堂〉词》(《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2期)、朱德慈《张养重生年考》(《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林玫仪《〈支机集〉完帙之发现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等。就涉及的范围而言,举凡遗民词人的生平、遗民词集的版本和遗民词的思想内容、创作手法及艺术成就等,在上述论文中分别有翔实的论证。

遗民词人人数众多,有相当一部分人物在政治、学术、文化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位置。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夫之、屈大均、金堡等名家身上。而对于其他成就卓著的作家则有所忽略,如王翊、彭孙贻、余怀、陆嘉淑等。研究的格局亦较为单一,只注重作家的个体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单个作家的生平及创作等问题上。汪泰际《论明末清初遗民词》一文对遗民词虽有整体的研究,但局限在创作实践的层面上,并未涉及遗民词人的词学主张及词学活动。林玫仪《〈支机集〉完帙之发现及其相关问题》虽涉及蒋平阶的词

学主张,但限于篇幅并未就云间词派的发展及明清之际词坛风尚的转变等相关问题展开论述。至于其他遗民词人的词学思想及其与清初词风转变的关系,亦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集中在学术思想文化层面上论述,注重分析明清士人尤其是明遗民在易代之际的出处问题和生存选择,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有别于遗民词人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在具体分析中,又忽略其理论观念与个人心态的关联;二、侧重于单一作家的某一方面的研究,缺乏对遗民词人群整体面貌的分析;三、重视对遗民词人中的名家进行研究,而忽略其他名气稍逊但成就卓著的作家。

三、研究目的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原始材料的辨析入手,从历史、地理、政治、文化、文学等多种视角来考察遗民词人群的地域分布、结构特征、生存状态及心理差异,探究遗民词人的词学观念、创作实践及其与清初词坛风尚转变的关系。

目前,关于遗民词人群的整体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本文拟将遗民词人群放置在明清易代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从点上分析子群的形态特征,包括群体所在地域的人文地理特征,包括乡土风俗、宗教、家族文化、人格特质以及词学风尚等,并探讨遗民词人在出处去就、生存方式等问题上的抉择和背后的心理动因;从面上考察子群内部、子群之间以及遗民词人群总体与外界这三方的动态关系。点面结合,以期更为真切地反映遗民词人群的原生状态。关于遗民的词学理论及具体创作,目前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将采用文献学与文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词集题跋、书信等文献资料中体现词学思想的材料加以梳理和比较,

另一方面结合当时词坛风尚的演变,对这些材料加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遗民词的创作在主题取向和创作手法上均有独特之处。本文注重将清初遗民词与明遗民之诗、南宋遗民词及明词加以比较,以显示遗民词在创作上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此外,本文将对清初的词选专集进行比较分析,钩稽清初遗民词的流播轨迹,从一个侧面揭示词史对清初遗民词的接受历程,以期更为全面地彰显清初遗民词的词史地位。

研究清初遗民词人群具有独特的文学、文化史意义。遗民词人在政治、学术、文化、文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遗民词人群为个案,既是文学的群体研究,也是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厘清遗民词人群的学术、文化与文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明末清初的士人心态,对于这一段历史有更为清晰全面的了解。